

黄文夫经济评论选

经济日报 出版社



H · W · F' S
ECONOMIC ESSAYS

黄文夫经济评论选

H. W. F' S ECONOMIC ESSAYS

经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2 号

责任编辑:李 越

责任校对:徐建华

封面设计:张志新

版式设计:王国瑞

黄文夫经济评论选

H. W. F' S ECONOMIC ESSAYS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地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6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036-744-4/F·352 定价: 6.80 元

序 言

1991年10月12~26日,《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版“每周评论”专栏里,连续刊登三篇系列文章,强调要“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文章根据当时诸多迹象判断:党和政府关于治理整顿经济的政策措施,在成功地运作3年之后,有可能于近期告一段落,并提出从现在起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既是巩固和发展治理整顿成果的需要,也是加速改革扩大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文章处理显要(开篇于头版头条位置),见报后遂引起海内外传媒及读者的广泛关注。正像文章所预见的那样,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半年后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宣布治理整顿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又一次改革开放高潮的到来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说句实话,我写这组文章时,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只是感到这个问题在当时似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有必要尽早提出来以供大家讨论。无论从当时各地改革升温的迹象看,还是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分析,都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工作重点实际已经转到加速改革推进经济增长上来。那么,治理整顿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理所当然是当前亟待考虑的大事。

我特别乐于像做上述文章那样就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作点“超前性”的思考,虽属应时之作,但还是尽量去寻求去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及其趋势。近年发表的《还要解放思

想》(1991年5月4日)、《称市场经济何妨》(1992年6月20日)、《唤起全社会的金融意识》(1991年8月24日)、《当心出现第四次地方保护主义浪潮》(1991年3月2日)、《中国开放“北移”?》(1991年6月8日)、《中国吸收外资的第三次高潮》(1991年9月7日)等,均属于这一类文章。当然,我也时常心血来潮,写些就事论事之类的文章,比如《评深圳股市持续下跌》、《静下来想想深圳股市风波》、《从吉祥包到购物券》、《改革,要为企业家护航》、《10-1=0》、《有必要重提实干真干》、《不是所有企业都要搞活》等。对于他人尤其友人新的经济论著或新的经济观点,有时也要评头论足一番。此类文章如《同业公会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兼与肖宁同志商榷》、《何不把小钱变成大钱——评〈共同投资基金〉》、《经济周期波动:中国学界面临的新课题——兼评〈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等等。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以来,我有意识地把相当的精力放在观察经济现象、研究经济问题、探索经济规律方面,所撰写的文章亦大多为经济生活和经济工作方面的评论或言论。我以为,经济评论和经济报道是经济报纸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作为一张现代化的经济报纸,不可能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报道,不然就不成其为经济新闻纸;也不可能没有经济评论,不然就不成其为一张真正意义的经济新闻纸。

诚然,我所理解的经济评论毫无疑问属于应用经济新闻学范畴,它是一种兼有新闻性与政论性的论文体,即以经济论文的形式来评论有新闻性的内容。所以经济评论的选题大多取材于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

与其他经济论文相比,经济评论更具强烈的新闻性与时

效性，它以新闻为根据，总是以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为其评论对象。经济评论的这种新闻性，构成了区别于其他经济论文的主要标志。

而经济评论的政论性，又构成了区别于其他经济新闻体裁的重要标志。比如以向读者真实地传播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为使命的经济报道，虽然也要表现一定的经济思想观点，但其表达方式主要是用事实说话。而以揭示或阐明经济新闻事实的本质、指明意义和发展趋势为其本能的经济评论，则是凭借说理论道来影响读者和社会舆论。

从经济评论的特性不难看出，它在现代经济新闻纸中确有其核心地位及特殊作用，即使称其为经济报道的顶峰也不过分。难怪当今许多有志于经济新闻事业的编辑和记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甘落后，都怕错过每一个锻炼和造就自己的机会。他们勤恳敬业，积极探索，勇于开拓，无不争当通晓现代经济知识，把握经济规律的行家里手。

尽管不敢奢望自己也能有朝一日成为一名经济评论家，但我总觉得作为一名经济新闻工作者，不会写经济评论或写不好经济评论，不能不说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所以自参加新闻工作起，我就为自己定下章程——必须学会写经济评论，力争作一名称职的经济新闻工作者。今天献给大家的这本集子，真实地反映了我在经济新闻和经济研究领域的探索过程。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找出差距，以期不断有所进步。

本书的出版，经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李越女士，管理世界杂志社义乌工作站站长骆毓龙先生，以及赵润庭、雷伟、马建国、张志新、王国瑞、徐建华先生等，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藉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后

本书收集了黄文夫同志自1984年8月至1993年8月所写的部分文章，共计64篇。所选文章大多是作者为《经济日报》、《第三产业报》和《中华工商时报》撰写的有关经济生活、经济改革、经济运行、经济研究方面的评论、社论、小言论、述评以及经济书评。其排列大体按照所涉重大经济事件的发展进程为序，基本保持文章原貌，文字亦未作改动，以体现作者在经济新闻和经济研究领域的探索过程。

编辑出版有关经济评论方面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还是个尝试。由于经济评论在经济新闻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经济新闻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作者在长期的经济新闻实践中，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经济评论文章，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探索者。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读者对经济评论这块舆论阵地更多的关心，能够为经济新闻工作者、经济理论工作者、经济管理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及广大热爱这一事业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李 越

1993年8月

目 录

序言

还要解放思想 (1991年5月4日) (1)

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 (1991年10月12日) (4)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再谈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

(1991年10月19日) (7)

深化改革亟须配套

——三谈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

(1991年10月26日) (9)

称“市场经济”何妨 (1992年6月20日) (11)

再学点现代市场经济知识 (1992年8月8日) (13)

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的分量 (1991年3月9日) (15)

让国门开得更大

——兼贺中国最大300家外商投资(三资)

工业企业排序揭晓 (1991年2月18日) (18)

法律保障 国门长开

——写在《合资企业法》修正案审议之时

(1990年3月21日) (20)

中国吸收外资的第三次高潮 (1991年9月7日) (22)

中国开放“北移”？(1991年6月8日)	(25)
可否在内地搞几个特区(1992年5月30日)	(27)
中国需要跨国公司(1991年11月9日)	(29)
要让外商赚钱(1986年11月)	(31)
90年代：关键的10年(1990年11月7日)	(33)
突破传统模式的中国计划体制改革 (1988年1月)	(36)
经济周期波动：中国学界面临的新课题 ——兼评《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 (1993年8月2日)	(56)
提高经济效益刻不容缓(1990年3月7日)	(60)
创造自己的“小气候” ——再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990年7月18日)	(62)
走出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 ——三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990年9月12日)	(64)
提倡“有效速度”(1991年11月23日)	(66)
以实际行动迎接'91效益年(1991年1月5日)	(68)
有必要重提实干真干(1992年2月15日)	(71)
10-1=0(1990年5月16日)	(73)
为国家队鼓与呼 ——兼贺九〇年度500家大企业排序揭晓 (1990年8月29日)	(75)
让“国家队”真正活起来(1991年7月6日)	(77)
不是所有企业都要搞活(1991年9月21日)	(79)

改革, 要为企业家护航 (1992年4月4日)	(81)
厂长你要大胆地往前走 (1991年9月28日)	(83)
实施企业兼并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1991年12月18日)	(85)
“第三次浪潮”与“第三个飞跃” ——《中国企业产权转让》评介 (1989年1月)	(87)
日本稳定企业的启示 (1991年4月6日)	(92)
做好流通大文章 (1992年2月29日)	(95)
当心出现第四次地方保护主义浪潮 (1991年3月2日)	(97)
同业公会符合市场经济法则 ——兼与肖宁同志商榷 (1993年3月1日)	(99)
造就中国的销售工程师 ——评《销售工程师手册》 (1993年7月)	(103)
唤起全社会的金融意识 (1991年8月24日)	(105)
金融理论的转折点 ——评《中国金融渗透论》 (1993年7月)	(108)
中国需要期货贸易 (1990年6月23日)	(112)
积极引入期货市场机制 ——再谈中国需要期货贸易 (1991年6月15日)	(114)
评深圳股市持续下跌 (1991年1月19日)	(115)

静下来想想深圳股市风波 (1992年8月15日)	(118)
何不把小钱变成大钱	
——评《共同投资基金》(1993年8月)	(120)
何时解开债务链 (1991年5月15日)	(124)
冷静下来的思索	
——“长城”集资案断想	
(1993年7月)	(127)
为债务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1987年2月16日)	(129)
锲而不舍开掘第一生产力 (1991年5月18日)	(131)
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主战场的战场	
(1991年6月5日)	(134)
中国需要机器人	
近千万职工的岗位可由机器人替代	
(1984年8月31日)	(136)
再谈中国需要机器人 (1984年9月5日)	(139)
发展第三产业是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	
(1985年10月1日)	(142)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 (1985年2月26日)	(144)
为我国第三产业起飞铺路 (1986年3月7日)	(146)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第三产业 (1985年3月)	(148)
旅游体制必须改革 (1984年7月17日)	(167)
发展和完善广告市场 (1991年11月30日)	(169)
人口：中国没有退路 (1991年5月25日)	(171)
中国住房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1991年4月20日)	(173)

再提适当缩减劳动时间（1991年12月7日）	(176)
从吉祥包到购物券（1991年2月23日）	(178)
90年代理论界首次盛会（1990年10月13日）	(180)
与改革同步发展的中国城市经济理论（1988年）	(186)
愿我国的学术园地繁花似锦 （1986年5月24日）	(210)
未来，属于优胜者 ——’90亚运与中华民族的竞争意识 （1990年10月）	(213)

还要解放思想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近日在北京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那些束缚我们的思想、妨碍我们大胆开拓的错误认识，坚持实事求是，大胆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几乎同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也在最近召开的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全省上下，尤其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封闭保守、满足现状的观念，彻底消除怕犯错误、怕冒风险的顾虑，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坚定不移地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带领群众推进改革，不断开拓前进。

两位党政领导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是非常及时的。据了解，当前的确存在思想不够解放的情况，其主要表现有：①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用市场调节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②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把它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有的同志还怕利用外资丧失主权。③在改革问题上把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对立起来，在治理整顿中，明明是过去行之有效的也不坚持。平均主义回潮，又重新吃大锅饭。④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企业领导人，甘当“小老板”、“小业主”，不想跳出小圈子，干大事。⑤在一部分同志中差不多思想严重，满足于“步于不大年年走，成绩不大年年

有”。⑥把经济建设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不能急于求成，与能办的事要办，要有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成的事也不认真去办。⑦对形势的分析，光看不利因素，看不到有利因素，更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克服困难，开拓前进。等等。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针对中国当时的现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着重论述解放思想的问题，提出并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人们的思想从一切束缚自己头脑的旧思想、旧框框中解放出来。它具体包括若干方面：诸如各级领导不仅自己要解放思想，而且还要为理论探索者和实践活动者创造一个能够放开思想、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敢讲真话的环境；作为理论探索者，在理论研究上，敢于突破书本上已经僵化的思想理论，在研究意识上，没有唯领导意志的倾向，在理论表述上，具有一种不加掩饰地追求真理的彻底性，在研究作风上，敢于走到改革的实践中进行研究；作为实践活动者，不但要运用正确理论作指导，而且还要创造性地运用理论，特别是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时，仍要敢于实践、敢于探索。

12年来，正是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获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才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199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8.8%，显著高于1953年到1977年每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1990年的居民平均消

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提高了1.1倍，平均每年提高6.5%；比1953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提高2.2%要快得多。1990年的人均居住面积同1978年相比，城市从3.6平方米上升到7平方米，农村从8.1平方米上升到18.5平方米。与此同时，改革使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变。这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12年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凡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企业，工作就打得开局面；反之，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必须有一个伟大理论运动的到来，而伟大理论运动的到来，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我们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关键时刻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将继续推动我们在新的10年再展宏图，为向新世纪更高的目标迈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华工商时报》1991年5月4日）

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

近来的诸多迹象表明，党和政府关于治理整顿经济的政策措施，在成功地运作3年之后，有可能于明年告一段落。

这个判断的首要根据是3年来的治理整顿取得了明显效果，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经济秩序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为进一步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条件。最近各地改革明显升温，一些重要改革分量加重，步伐加快。比如天津采取果断措施关停一批产品过剩且扭亏无望的企业，停产、限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又如上海比照“三资”企业政策在一批国营大中型企业中进行转换经营机制的试点；还有深圳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经济运作机制等等。中共中央在最近召开的工作会议确定，今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在巩固治理整顿成果和继续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争取在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方面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

治理整顿经济的方针，是中共中央1988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其背景是由于连续几年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货币投放过多，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以致在1988年下半年诱发了抢购风潮。通货膨胀和流通秩序混乱，不仅使国民经济难以健康发展，改革

无法顺利进行，人民生活也得不到安定。为此政府当机立断，下了最大的决心，把近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3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3年来的治理整顿，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现在起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加速改革以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活与不活，关键在于它们运行于其中的体制环境和企业自身的机制。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大都是在改革中诞生的，从产生到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旧体制的束缚，它们的投资活动和生产经营基本上没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企业运行也没有纳入原来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它们实际上是在宏观间接调控和市场导向的体制下运行的。而国营企业则是在经过一定程度改革但仍不彻底的体制下运行的。不同的体制环境必然造就出截然不同的企业经营机制，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不同，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的不同等等。

由于传统的企业经营机制运行了几十年，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转换过程并非易事，唯有加速改革，才是转换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最有效途径。尽管我们的各项改革在治理整顿中一直没有停顿，不少地区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还逐步加大了改革分量，但我们如果不从现在起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我们仍会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贻误良机，其结果不仅仅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有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3年来的治理整顿也将功亏一篑。

从现在起着眼于治理整顿之后，既是巩固和发展治理整顿成果的需要，也是加速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相信每个